

对话成功之要素融合

——周恩来与池田大作有关对话的理论与实践

高岳仑 刘斌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廖承志与池田大作研究中心）

摘要：周恩来总理与池田大作先生有关对话的理论与实践，从态度、目标、方法、导向诸方面，证实对话成功的真谛在于对话成功诸要素的融合与共同发力，即：相互尊重的真诚态度、坚定秉持的共赢目标、灵活应变的对话艺术、珍爱和平的发展导向一项不能少，对话方可获得成功。

关键词：对话 成功要素 融合 和平与发展

五十年前，周恩来总理与池田大作先生在北京的会见，是一曲珍爱世界和平、促进人民友好的赞歌，迄今余音绕梁！今天，我们回顾并探讨他们有关对话的理论与实践，是对这一历史性会见的具有现实意义的纪念。

一、态度——尊重与坦诚是对话成功之源

人间对话无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乃至生活等方方面面，成功要素位列之首的基础是说起来有点虚，实际上最实在的态度，尤其是对话主动方率先呈现尊重对方、坦诚表达的对话态度。周恩来与池田大作在这方面堪称表率。

早在1955年的亚非会议（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就曾以独特的外交风范赢得了亚非各国代表的心。

在会议上，各国情况复杂多样，矛盾分歧众多。周恩来总理以尊重为基石开启对话。他尊重不同国家的主权、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在发言中明确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这一方针避开了意识形态等容易产生分歧的话题，强调亚非国家间的共同利益，即反帝反殖、争取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等。这一理念体现了对各国平等地位的尊重，不将大国意志强加于他国。

从对话的起点来看，周恩来总理以真诚的态度对待各国代表的质疑和误解，不失为良好的开端。当时，国际形势复杂，一些西方国家妄图破坏会议。周总理用真诚的话语，耐心地阐述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化解了许多国家的疑虑。他积极地与各国代表交流互动，倾听不同的声音，使得会议能够顺利进行并达成诸多共识。周总理在亚非会议上开创了中国与亚非国家广泛交往的新局面，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他以尊重和与真诚为外交起点的模式，成为国际关系交往中的典范，为后续发展中国家间的合作以及南南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至今仍然激励着中国外交不断发展创新，始终以积极、包容的态度参与国际事务。

相比周恩来总理年轻三十岁的池田大作先生，也有着相同或相似的对话理论与实践。

池田先生作为日本创价学会名誉会长、世界著名的佛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作家和国际人道主义者，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令人敬佩的积极作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池田先生与牛津大学专事英国新宗教运动研究的社会学家布莱恩·R·威尔逊开展对话并合著《社会与宗教》（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10月出版）。他们在对话中彼此尊重、各抒己见、求同存异，堪称各类对话的通用样本，意义非凡。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考察态度的重要及其在对话中的作用：

——观点的表达与倾听：在对话中，池田大作基于自己的佛教信仰和对宗教的理解，阐述了宗教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宗教对人心的引导作用以及宗教所承载的精神意义等观点。比如，他强调佛法对于拯救堕落人心的重要性。而布莱恩·R·威尔逊作为一名研究宗教的社会学家，从社会学的理论和研究视角出发，探讨宗教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宗教与社会变迁的关系等问题。双方都能够认真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并且给予对方充分的时间和空间来阐述想法，没有因为观点的不同而随意打断或否定对方。

——对不同观点的探讨：当涉及到宗教与现代社会的伦理、政治、医疗、教派等具体问题域时，两人的观点存在明显的差异。例如，在宗教与政治的关系上，池田大作可能更强调宗教对于政治的积极引导和影响，认为宗教的精神力量可以促进社会的和谐与进步；而布莱恩·R·威尔逊可能会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宗教与政治的相互作用，关注宗教在政治体系中的角色和功能。然而，他们并没有因为这些差异而产生激烈的冲突，而是以理性的态度探讨这些问题，分析各自观点的依据和逻辑。

——求同存异的体现：尽管在很多问题上存在分歧，但他们也能找到一些共同的关注点和共识。比如，双方都对宗教的社会任务表示关切，都认为宗教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的生活有着重要的影响。在探讨过程中，他们能够聚焦于这些共同的关注点，承认彼此观点中的合理部分，同时也保留自己的不同看法。这种求同存异的态度使得对话能够持续进行，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双方对问题的深入理解。

二、目标——坚定与共赢是对话成功之本

大凡对话，必有目标，或曰目的；坚持向着目标持续挺进直至实现目标，这才可以说对话成功了。周恩来在新中国与苏联政府间对话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实现了废旧立新（中苏条约）的坚定目标，促进双方合作共赢。池田大作与环境学家、罗马俱乐部共同主席、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有关永续资源管理之国际论坛”共同议长恩斯特·乌尔利希·冯·魏茨泽克的对话，坚定体现了无战争、无核武的目标，其主张人类共建环境友好的世界成为对话双方的共同愿景。通过学习和研究《地球革命的挑战——谈人类与环境》（台湾创价文教基金会 2018 年 9 月 8 日一版），我们真切领会到确立和坚定实现对话目标何其重要。

我们先简述周恩来在中苏政府间对话过程中，怎样坚定实现目标，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和国家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首先，为了实现合作双赢的目标，认真做好前期准备与沟通协调工作。在确定中苏政府间对话的重点和目标的同时，周恩来充分考虑了国内经济建设的需求、国防安全的需要以及国际形势的影响等因素，为中国代表团制定了明确的谈判策略。周恩来对中苏关系的历史经纬、旧条约的不平等性以及新中国对新条约的期望有着深刻的认识和准确的把握。他清楚地知道，废除 1945 年国民党政府与苏联签订的不平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新的平等条约，对于新中国的主权独立、外交形象以及国家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此，在毛泽东访苏之前，周恩来就积极参与相关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为后续的谈判做了充分的准备。

随后，为实现既定目标解决具体细节问题。周恩来对话中的各种具体细节问题高度关注，亲自参与讨论和解决。他对条约文本的每一个条款、每一个字都进行了认真的斟酌和审核，确保条约的内容准确无误、符合中国的利益。例如，谈到中苏贸易协定，他对进出口货单、市场价格、交货条件等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分析，提出了合理的建议和解决方案，为中苏贸易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基础。

其后，将对话成果转化为目标行动，件件落实、推动合作。1950 年 2 月中苏双方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后，周恩来积极推动条约的落实和执行。他与苏联方面保持密切的沟通和联系，及时解决在条约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困难。例如，在中苏贸易合作方面，他关注贸易协定的执行情况，督促相关部门做好贸易往来的组织和管理工作的，确保中苏贸易的顺利进行。

我们再简介一下池田大作与恩斯特·乌尔利希·冯·魏茨泽克对话时，为坚定和平与无核武目标所倡导的主张与努力。

池田大作一生致力于推动世界和平、文化交流与教育发展等事业。他坚信个人以及文明之间开诚布公的对话对于人类和谐团结至关重要。所以，他与恩斯特·乌尔利希·冯·魏茨泽克进行对话，总是围绕着主张和平、反对核武、保护环境而深入展开；同时还对如何推进国际交流与合作、不同文化和文明间的相互理解等方面深入探讨。

池田大作一直倡导和平共处、反对战争与暴力，强调通过对话和交流解决国际间的矛盾与冲突。他重视教育对于人类发展的重要性，主张通过教育培养具有全球视野和和平理念的人才。并且，他积极推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认为文化的相互理解和融合能够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在与恩斯特·乌尔利希·冯·魏茨泽克的对话中，他非常充分地表达这些方面的主张。

池田大作曾出访过世界 54 个国家和地区，与全球领袖、诸多科学家、学者开展了广泛和深入的对话，为我们探讨如何在国际社会中更好地实现和平、合作与发展并付诸实践作出了表率，因此，他荣获联合国颁发的“和平奖章”可谓实至名归。同时，他也为中日友好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多次率团访华，受到中国领导人的接见，并获得了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授予的“中日友好贡献奖”等荣誉。

三、方法——灵活与艺术是对话成功之技

新中国成立前夕，国内政治生态相当复杂。为了更好更快地制定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周恩来主动与各民主党派代表和各界民主人士开展了高频次、高水平、高效率对话，展现出高度灵活与对话艺术。比如在与宋庆龄等民主人士对话时，通过真诚的沟通、尊重和对他们价值理念的理解，积极邀请他们参与到建立新中国的筹备工作中来。周恩来深知这些民主人士在国内外的影响力，他以极大的耐心、谦逊的态度与之交流。在商讨中央人民政府组成、新政协会议筹备等过程中，周恩来细致入微地解答他们的疑问，尊重他们的意见建议并合理吸纳，使得民主人士心悦诚服地团结在共产党周围，积极投身于新中国的创建大业。周恩来一系列的交往对话既体现了原则性，又充满灵活性与高超的交流艺术，为新中国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和广泛的社会支持。

经历一系列成功的对话之后，周恩来感慨地说，《共同纲领》是各党派共同千斟万酌的结果。民主建国会代表章乃器深有感触地说，通过富有成效的对话，大家在讨论《共同纲领》时，“做到了多数起了决定作用，少数心悦诚服。这才是真正的、彻底的民主。”

众所周知，在上个世纪 70 年代的世界处于大动荡、大改组、大变化时期。当时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争霸激烈。美国由于长期对外扩张，特别是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实力遭到削弱；而苏联乘机扩充军备，并依仗其膨胀起来的军事实力对外扩张，在双方激烈争夺中，出现了苏攻美守的战略态势。许多国家基于新的国际形势开始调整外交政策。例如中美关系开始缓和，尼克松访华；在池田大作等有识之士的长期呼吁和推动下，中日邦交终于实现正常化。那个年代，西方经济滞胀，日本经济却异军突起，这不仅影响了世纪经济格局，也引发了人们对东方经济模式和文化价值的关注。

在此背景下，池田大作与汤因比走到一起，展开了一场精致而深邃的对话，横跨全球，谈古论今，《展望 21 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 1985 年 11 月北京第一版），产生深远影响。概括起来，这次不同凡响的对话有如下一些特点：

（一）形式新颖。

1、跨文化跨地域的对话模式

池田大作是生长于日本的著名思想家、宗教家，而汤因比是根基在英国的著名历史学家。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和文化背景，这种跨文化、跨地域的对话形式在当时是比较新颖的。他们在面对面的对话之前，通过书信交流的方式进行对话，打破了地域和时间的限制。这种交

流方式使得双方能够深入思考对方的观点，精心组织自己的回应，避免了面对面交流可能出现的仓促和即时性的干扰。

2、多元视角的融合

在对话中，思想家、宗教家的哲学、宗教思考视角，与历史学家的宏观历史视野及历史规律探讨相结合，产生了震撼心灵的奇效。池田大作从东方的佛教哲学、日本的社会文化等角度出发，提供了关于人类生存、道德伦理、社会发展等问题的独特见解。汤因比则以其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刻研究，从宏观的历史长河中分析人类文明的兴衰成败；这种多元视角的融合，为探讨全球性问题提供了更全面、立体的框架。

（二）内容精彩

1、对人类文明的宏观探讨

在关于人类文明的发展路径上，他们深入讨论了各种文明的起源、发展、衰落的原因。例如，池田大作以东方文明的发展为例，提出东方文明中的和谐、共生等理念对于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汤因比则阐述了他著名的“挑战－应战”理论，认为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是人类面对各种自然和社会挑战时做出应战的结果。他们还探讨了不同文明之间交流与冲突的影响，指出文明之间的相互借鉴和融合是推动人类进步的重要力量，而冲突则可能导致文明的衰落。

2、对人类未来的前瞻性思考

对话涉及到人类在面临现代性问题时的应对策略。他们关注到科技发展带来的双面影响，如科技进步虽然提高了人类的物质生活水平，但也带来了环境污染、资源枯竭、核威胁等全球性问题。池田大作和汤因比提出人类需要从道德伦理、精神文化层面进行深刻的反思，倡导建立一种全球性的伦理观念，以引导人类正确地运用科技力量。他们强调人类的未来取决于人类自身的选择，只有通过全人类的共同努力，建立一个尊重生命、追求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全球社会，人类才能避免自我毁灭，走向光明的未来。

3、对宗教价值的深入挖掘

池田大作从佛教的角度出发，汤因比从对基督教等宗教的研究出发，探讨宗教在人类社会中的作用。他们认为宗教可以为人类提供一种精神寄托和道德规范，超越国家、民族的界限，促进人类的团结与和谐。同时，他们也指出宗教在历史上曾被错误利用而引发战争和冲突，因此需要对宗教进行正确的阐释和引导，使其成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积极力量。

总之，周恩来与池田大作分别以坚定与灵活、深刻与艺术完美结合的对话，为人类文明增添了一抹特别的光彩。

四、导向——和平与发展是对话成功之景

对话成功的标志不仅是现实目标的实现，还应绘有可持续发展的蓝图，以及今后发展的方向和务实前行的措施、保障。这一切的关键词是为“导向”。

周恩来总理与首次访华的田中角荣首相会见、会谈，就是一次导向明确的成功对话，为发表中日《联合声明》、发展中日两国持久和平友好关系指明了方向。

回首1972年，由于周恩来与田中角荣坚持维护和平、促进发展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导向，所以，一场两国邦交正常化的外交谈判实质则是勿忘历史、面向未来的政治对话。概括这场意义重大的对话，非常突出的导向主要体现在三大方面。

（一）外交关系正常化导向

1. 恢复中日邦交刻不容缓

在周恩来与田中角荣会见和对话之前，中日两国关系长期处于不正常状态。双方都意识到改善关系对于地区和平稳定以及各自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尽快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是厘清历史认知、解决遗留问题的先决条件。对话切实按照这一明确导向所做的努力是非常成功的。对话过程中，无论是在讨论两国关系的历史遗留问题，还是在规划未来双边关系的框架，都

以恢复邦交为新起点，朝着世代友好、和平发展的方向奔跑。

2.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必须合作

此次对话也体现了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导向。在冷战的国际背景下，中日两国超越了当时的阵营划分观念。中国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日本也开始探索在美日关系框架之外发展与其他国家关系的路径。

周恩来与田中角荣的对话是基于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进行的。双方都认识到，建立正常的中日关系将为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奠定基础，这有助于打破冷战格局下的一些外交局限，为构建新型的双边关系以及地区国际关系提供范例。

（二）历史问题导向

正视历史的导向

在对话中，对于日本侵华历史等问题有着明确的导向。周恩来明确指出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要求日本方面正确对待历史。田中角荣也表示日本对过去的战争行为有深刻反省。

这种对历史问题的正视是会谈的重要导向之一，它为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只有正确认识历史，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建立起基于相互信任的外交关系。

（三）经济合作与文化交流导向

1. 经济合作导向

对话明确了中日两国在经济合作方面的前景。当时，日本经济处于高速发展阶段，而中国也开始探索经济建设的新路径。双方都看到了彼此在资源、市场、技术等方面的互补性。

对话过程中，双方就开展贸易、技术交流等经济合作事宜进行了讨论，为后续中日之间广泛的经济合作开启了大门。这种经济合作的导向在会谈中是清晰的，旨在促进两国的共同发展。

2. 文化交流导向

周恩来与田中角荣的对话也为中日文化交流指明了方向。中日两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交流历史，重新建立正常外交关系将促进两国在文化领域的再次互动。对话的成功为文化交流奠定了政治基础，双方都有意愿推动文化交流，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这一导向有助于加深中日两国在精神层面的联系。

检验一场对话成功与否，不仅看双方的思考方向和重点是否正确，更要看对话中指出的行动方向和方式是否切实可行。进一步说，通过对话能够提供正确的思维导向与行为导向，这是对话成功的重要标志之一。

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池田大作在与香港中文大学第六任校长刘遵义的对话中，共同分析了世界金融危机的教训，着重引导人们《塑造崭新的国际社会——探索二十一世纪的和平、经济与教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16 年出版），同样展示了对对话导向的重要作用。并予以深刻阐述。

（一）经济发展与合作导向

1. 全球经济一体化视野

从经济角度看，他们的对话体现了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积极推动导向。刘遵义作为在经济领域有深入研究的学者，带来了关于全球经济运行机制、贸易模式以及区域经济发展等方面的专业见解。池田大作从社会与人文的角度，探讨经济发展与人类幸福、社会公平之间的关系。

这种对话促使人们思考如何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加强不同国家和地区在贸易、投资、技术等方面的合作，以打破贸易壁垒，实现互利共赢。例如，他们可能探讨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之间如何更好地协作，共同应对全球性经济危机，为塑造一个经济上相互依存、协同发展的崭新国际社会奠定基础。

2. 可持续经济发展理念

对话强调了可持续经济发展的导向。在当今世界，资源有限性和环境问题日益凸显。他们的讨论可能涉及如何引导各国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相结合，推动绿色经济、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

倡导企业和国家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注重生态保护和资源的合理利用，通过对话传播这种理念，促使国际社会在制定经济政策、发展战略时将可持续发展作为重要考量因素，从而塑造一个在经济发展上更具长远眼光、兼顾当代和后代利益的国际社会。

（二）文化交流与多元包容导向

1. 文化交流促进理解

池田大作与刘遵义的对话体现了文化交流在塑造国际社会中的重要导向。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可以增进国家和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池田大作作为日本的文化使者，在对话中能够传达日本文化中的价值观、传统智慧等内容。刘遵义可以从中国文化以及多元文化交融的角度出发，阐述文化交流的意义。

这种对话有助于打破文化隔阂，消除文化误解，使国际社会更加尊重和欣赏不同文化的独特性，构建一个多元文化相互包容、相互借鉴的国际环境。例如，通过文化交流，可以让西方国家更好地理解东方文化中的和谐、集体主义等价值观，也让东方国家更好地吸收西方文化中的创新、法治等理念。

2. 多元文化共生理念

他们的对话倡导多元文化共生的理念。在国际社会中，没有一种文化是绝对优越的，各种文化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对话可能强调各国应尊重文化多样性，在国际事务中平等对待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 and 民族。

这种导向有助于建立一个基于多元文化共生的国际秩序，避免因文化冲突而引发的国际矛盾，使国际社会更加和谐、稳定，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能在多元文化的国际舞台上发挥自己的独特作用。

（三）和平与和谐导向

1. 和平解决国际争端

在对话中，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导向十分明显。他们可能探讨国际关系中冲突的根源，如地缘政治、资源争夺、意识形态差异等，并倡导通过对话、谈判、协商等和平方式来解决这些争端。

这一导向有助于改变国际社会中部分国家依赖武力或单边主义解决问题的模式，推动建立一个以和平方式处理国际事务、以对话构建国际关系的崭新国际社会。例如，在处理领土争端、贸易摩擦等问题上，倡导各国遵循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通过和平手段寻求解决方案。

2. 构建和谐国际关系

池田大作与刘遵义的对话也体现出构建和谐国际关系的导向。这种和谐关系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和谐。从政治角度看，各国应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平等相待；在经济上实现互利共赢；在文化上相互包容。

通过这种导向的传播，可以促使国际社会向构建一个和谐、有序、稳定的国际关系体系发展，每个国家都能在这样的体系中与其他国家和谐共处，共同发展。

本文小结

在纪念周恩来与池田大作历史性会见 50 周年的今天，我们初步研究了他们为世界和平、发展与合作是如何重视对话、积极对话、善于对话的理论与实践，这仅仅是“初步研究”，因为我们的理论功底不够深厚，对相关理论精髓与实质的提炼水平不高，我们只是粗略介绍

了两位大师若干经典的对话实践。虽然我们深受启发，有所顿悟，感触颇深，但不够全面。平心而论，若概括我们学习与研究的体会，的确有一种发自心底的呼唤：让我们以对话替代对抗，以和平替代战争，以共赢替代垄断，以包容替代排斥，以理解替代误解吧！